

彝族典籍文化

朱崇先 著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彝族典籍文化

朱崇先〔彝〕 著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 184 号

责任编辑：戴佩丽

封面设计：李金文

彝 族 典 籍 文 化
YI ZU DIAN JI WEN HUA

朱崇先

*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西郊白石桥中路 27 号)

(邮政编码：100081)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东方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 6 印张 128 千字

1994 年 8 月第 1 版 199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1-2000 册

ISBN7-81001-917-1/K·114

定价：5.50 元

序

马学良

“山东保罗”，这是 50 多年前我在云南彝区调查语言时，当地彝族人民加给我的美称。

往事如烟，说来话长，只好长话短说。在那民族歧视的年代里，把民族地区视为“禁区”。1941 年原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派我到云南彝区调查彝语，学习彝文。我只身到云南禄劝、武定彝区，每到一地，彝族群众对我投以敬畏的目光，我对他们也只能相视而笑。我深知我们之间缺少接通感情的语言，因而我下决心先学习彝语，几个月后，我学会一些日常会话，这在我们之间似乎架起了一道沟通彼此心灵的线路，我们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了。白天跟他们一起下田或打猎，晚间在火塘边闲话，日子久了，我的彝话也越来越熟练了。一天晚上，一位老人问我的家乡，我答以“山东”，他接着问：“山东也有保罗？”我顺便应对“有”。他们会心一笑，从此称我“山东保罗”。感情更加密切了，亲如一家。我用语言打破了“禁区”，在生活，学习上使我受用不尽。我个人得了语言的好处，因而，我对去民族地区工作的人和我多年培养的学生，都要他们先要学会所到地区或从事某种民族工作的语言，这是沟通心灵的信息网，是进行各项工作的重要工具，几十年来，我和我的学生闯民族地区，都尝到了这个甜头。

语言打开了“禁区”，语言接通了感情，彼此间有了共同的语言，亲密无间，团结互助，开发边疆、建设边疆，早日

实现四个现代化，语言成了开路先锋。文化建设是四个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字是一个民族从野蛮到文明的分界线，彝族有古老的文字，有丰富的经籍文献，代表彝族优秀文化传统，但自明末以后，日渐衰微，建国四十多年来，在党和政府的民族语文政策指引下，整理彝文古籍、翻译彝文古籍，培养翻译彝文古籍的专门人才，成立彝学研究机构，出版了大量的彝族经籍文化书籍，使彝族文化大白于天下，大大丰富了中华民族的文化。

然而，四十多年来，由于种种原因，我脱离了彝区，中止了彝文古籍文化的研究，我这“山东傈罗”，日渐“汉化”，真无愧对彝族父老当年对我的鼓励 and 希望之感！

所幸近十年来，喜见彝文专门人才辈出。从五十年代起，中央民族学院就培养彝语文专业的彝、汉族学生，八十年代设立彝族历史文献专业，专门培养整理翻译彝文古经籍的专门人才，朱君是该专业第一届毕业生之佼佼者。其它民族院校也先后开设同类专业，翻译出版很多彝族语言文学的专著，因而研究彝学的人才不单是“山东傈罗”，而是分布到许多省区，在这大好形势下，我也恢复旧业，把我青年时期在彝区收集的资料，重加整理、翻译，尤其当年在彝区即下决心编一部翻译彝文经籍的文化词典，未及完成，在南京解放前夕，由我供职的原中央研究院史语所装箱运往台湾，直至1985年经我的师友辗转带给我，我认为翻译彝文经典，弘扬彝族优秀文化，一部翻译词典是必不可少的，因而我邀朱崇先和范慧娟二位协助我编纂彝文经籍文化词典。朱君就是本书的作者，他对卷帙浩繁的彝文经籍及种类繁多内容丰富的彝文文献作系统的综述，初次提出将彝文文献划分为十个地区类型，并对每个地区类型的文献特点作了概括性评述，虽然有些问

题还需要进一步探讨，但已突破前人拘守成规的分类法，尤可贵者，本书通过古彝文专著的系统研究和重要篇章的选译和提要，并详加注释，为彝族历史文化研究提供了翔实的文献资料，是考察彝族历史、研究彝族传统文化的重要文字依据。

在翻译技巧上作者采用四行对照法译注，因限于印刷条件，仅录译文及注释，但尚能字斟句酌，既不失原意，又尽可能保持原文的风格。翻译是一件重要的文化工作，关系到彝族文化的继承发扬，应当以科学的态度对待这一问题，不可掉以轻心。

本书是作者集十多年彝文典籍翻译和整理研究的成果，文中提出不少新问题和独到的见解，是一部不落窠臼富有创新的著作。

记得西方有一位词典编纂家说过，如果谁下地狱，那就让他去编词典，依我看来，翻译彝文古籍的苦况，并不比编词典好些，照此说来，朱君十多年来既编词典，又翻译彝文古籍，算得上两次下地狱，我佩服他坚韧不拔的毅力和甘愿下地狱的精神。

回忆五十多年前，对比当前，感慨万千，因写此文以记怀并为序。

1994年6月23日

目 录

序	马学良
丰富多彩的彝文文献	1
一部珍贵的明代彝文手抄经典	20
云南昆明西郊彝族生活图谱述略	30
彝文《罗婺姻亲史》译释	39
彝文《且宝赔铃记》译释	54
彝文《彝汉天地》译注	73
武定彝文《指路经》译注	96
彝文《强宗呗毫叙谱经》译注	113
武定彝族格言辑录译注	120
彝族古典文学《依依苏》译注	137
彝文典籍提要	158
彝族礼俗文化札记	169
后记	182

丰富多彩的彝文文献

彝族具有悠久的历史，在彝族的开化史上，彝族先民较早地创造和使用自己的文字——彝文。彝文作为一种古老的文字体系，无疑是彝族先民早已进入文明社会的重要标志。它凝聚着彝族人民的思想与智慧，体现了彝族先民的发明创造精神。彝文的使用极大地推动了彝族社会的发展，更促进了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光大。历史上彝族的人文圣们，用彝文进行著书立说，形成丰富的文化典籍和众多的文献资料。

彝族历史文献作为彝族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以其浩瀚的卷帙与广博宏富的著述内容，涉猎了彝族传统文化的方方面面，集中地体现了彝族社会发展进程中所创造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它作为彝学殿堂中的一座知识宝库，荟萃了彝族传统文化之精华，既是前人为人类社会留下的一份珍贵的文化贵产，也是供后人学习借鉴的知识财富。彝文文献作为投影彝族社会发展史的一面镜子，真实地再现历史，客观地反映各种文化事象，是我们认识彝族历史文化的依据。

彝文文献作为特定历史阶段的文化产物，汇集了不同时代的文化特质。由于历史的局限，许多文献典籍，未能形成学科特点鲜明的专著，而把天文地理、历史文化、政治经济、宗教礼俗、工艺技术、哲学思想、医学病理、占卜预测等融为一炉，往往将自然知识与社会知识汇为一体。因此，彝文文献在彝族历史文化的研究中居于重要地位，具有多方面的学术研究价值。

彝文文献的学术研究价值及其功用，早已引起史家和学人的极大关注。用彝文书写的所谓“夷经”早已载入汉文史籍之中。如东晋常璩《华阳国志·南中志》载：“夷中有杰黠能言，议屈服种人者，谓之耆老，便为主，论议好譬谕物，谓之夷经，今南人言论，虽学者亦半引夷经。”可见彝文经典中的书面语为西南学者们所推崇，在言论之中达到半引“夷经”的程度。元、明两个朝代所撰修的西南地方志中多有引用夷经内容者。到了清代所撰之方志更是大引特引，甚至把彝文经籍的整篇内容译作志书的附录，可见其重视程度之高。如道光《大定府志》卷四十九《水西安氏本末》中附录《土目安国泰所译夷书九则》。当时彝族学者安国泰已对彝文文献作了系统的研究，并作了内容分类。他在《夷书九则》中说：“书籍曰命理，言性理者也；有曰苴载，记世系事迹者也；曰补书，巫祝书也；曰弄恩，雅颂也；曰怯杰，讽歌也；又有勘與禄命书。”

上个世纪以来，西方帝国主义势力逐步伸入广大彝区。彝文文献，也成了文化劫掠的对象。法国天主教传教士保·维亚尔在路南等彝区传教达30年，搜集了大量的彝文文献，发表了数种有关彝文的专著和文章，编纂出版了《法罗字典》。他1898年在上海出版的《罗罗》一书中，将彝文文献分为6类：（1）创造说：世界的开始；b 人类的由来。（2）人类的三体合一反抗神圣的三体合一。（3）世界的大旱时代。（4）世界的洪水时代。（5）世界的黑暗时代。（6）人类的救援。1906年～1909年，法国少校多龙率领的考察团，足迹遍及川、滇、

黔三省彝区。对彝族的历史、社会、语言文字进行了深入调查，并将大量的彝文文献盗运回国。多龙将彝文文献分为：(1) 家族系谱。(2) 洪水传说。(3) 人类分布传说。(4) 计数术。(5) 飞禽走兽述录（自然科学）。(6) 山河纪录（地理）六种。

本世纪 20 年代末，著名的民族学家扬成志先生赴滇调查民族情况，搜集了大量彝文文献。在 1931 年的《云南罗罗族的巫师及其经典》一文中，他将“独立罗罗”“撒弥”“夷教”3 个支系的 130 部经典分为：献祭类、祈祷类、酬愿类、做斋类、禳拔类、关于动植物各自然物经咒、咒术技法类、婚姻和生产类，丧葬及祭祖类、农业类、火神类、雷神类、龙王类、李老君类、占卜类、历史与传说类。每一大类下列经书名称，如在咒术技法类下列退咒经、赌咒经、播弄冤家经咒、解冤结经咒、驱逐野兽经咒、狗上屋顶退送经咒，止风神经咒。祭山谷回声鬼经咒、治病痛经咒，解罪孽经咒十种。杨先生认为这一分类旨在展现彝族的整个精神生活——文化、思想、信仰。阐明彝族的生活俱受宗教的和巫术的支配。

30 年代后期马学良先生深入云南武定，禄劝、寻甸一带彝区研习彝语文，调查彝族的宗教、风俗、礼仪制度等。他在 1947 年发表的《傈族的巫师“呗耄”和“天书”》一文中，根据所搜集的二千余册经书（现分藏于北图、清华、南开等图书馆），将彝文经书分为 9 类：

(一) 祭经 (1) 作斋经；(2) 作祭经；(3) 百解经；
(4) 除崇经。

(二) 占卜经 (1) 膀卜经；(2) 鸡骨卜经；(3) 签卜经；(4) 占梦经。

(三) 律历 记节令、星辰、岁月、冲克等。

(四) 谱牒 各支系之宗谱及其发源地。

(五) 诗文 古人之诗歌及理论作品、如女诗人普筹荷格之抗婚歌。

(六) 伦理 记日常应守之条律及待人接物之态度。

(七) 历史 记历代祖先的丰功伟绩及各种建树。

(八) 神话 如洪水神话。

(九) 译著 如彝文所译之《太上感应篇》。

以上每类经书包括书籍多种,从马学良先生的分类来看,对宗教类的经典分类较得当、简明,除了宗教类外,还注意对非宗教经典的搜集归类。

1981年四川、云南、贵州的彝族经师,共同为北京图书馆、民族文化宫和中央民族学院民族博物馆所藏的包括云、贵、川、广西彝区的659部。一千多册彝文经书分类编目,其中78%的经书是马学良先生从云南禄劝、武定等县搜集而来的。按其内容分为11类:历史书56部、哲学书28部、文学书35部、历算书43部,作斋经91部、作祭经211部、指路经19部、占卜书22部、百解经70部、福禄书17部、其他类7部。

许多专家学者,不仅对彝文文献内容作了分类介绍,而且对彝文文献的文化价值作了极高的评价。如杨成志先生在《云南罗罗族的巫师及其经典》一文中说:“罗罗经的语句,多系五言,意义简朴,音韵自然。且其段落分明,毫无错乱。虽其中有长短句,要之,讽诵起来,也极合着节奏,纯是一种古诗词的上品!关于精神的经典,其中神名一个一个地列举出来,没有倒置或纷歧之弊;关于咒语和符篆的能加以注解和举例;关于插图……也能使人物匀称和表达出经中的深意。

至其字画的古劲和秀丽，更可做我国文字学家的参考品”^① 马学良先生对彝文典籍《勒俄特依》和《居子猴子谱》中关于猿猴变人的记述，给予高度评价，说“这种以物质为根源的朴素唯物主义的认识，较之宗教唯心主义上帝创世说的观点，从中已透露出一线科学的曙光”。^② 马学良先生在《研究彝文古籍发扬民族文化》一文中指出：“彝族历史文献是一份珍贵的民族文化遗产，它不仅是研究彝族文化历史的重要资料，而且彝族自古以来就与其它民族有密切的关系，如史学家考证‘氐羌民族，在周秦和两汉时代，已经有许多不同支系，尤其是从川西到大理，与当地土著文化合流，发生变化，于是支系更多，特点更多’。羌族是彝族的前身，时至今日，彝族是这些支系的民族中少数有文字的民族之一，有丰富的彝文古籍。其中包括我国远古的文化和与其他民族的关系史，因此可以研究这些支系民族的历史、社会生活，提供重要的史料。”^③

总之，随着彝文文献整理研究工作的深入，彝文文献的学术研究价值的认识也会随之提高，许多彝文典籍和文献资料亟待发掘利用。

二

本世纪八十年代掀起了抢救和发掘彝族历史文献的热潮。国家民委发出关于抢救彝族历史文献的文件后，云、贵、

① 杨成志《云南罗罗族的巫师及其经典》载《毕摩文化论》云南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

② 《马学良民族研究文集》574 页，民族出版社 1992 年版。

③ 《马学良民族研究文集》578 页，民族出版社 1992 年版。

川三省彝区的有关单位从民间收集了大量的文献。如云南省楚雄州彝族文化研究所在短短的几年内搜集了 672 册。贵州毕节彝文翻译组先后搜集了三千多册彝文古书，云南红河州查明保存在全州各地的彝文文献共计两千卷以上。四川凉山搜集到彝文古书有 388 种。在云贵川三省均已发现彝文石刻。贵州毕节地区现已发现彝文碑刻 246 块，已拓片 199 块，云南武定、禄劝两县发现摩崖石刻多处，墓碑近千座，仅在己梯村就有二百多块。为我们对彝文文献进行较为全面系统的认识了解，提供了有利条件。据目前掌握的文献实物，可将彝文文献的载体归纳为若干种类。如石刻、铜器、木牍、皮书、陶器、纸张，此外还有畜角、兽骨、竹简、布帛等等。现作如下分类介绍：

1. 石刻文献

即刻在石头上的文字材料。这类文献在云、贵、川三省彝区均有发现。贵州毕节彝区的石刻多有年代可查。而四川凉山的彝文石刻几乎没有刻写年号、时间，刻工多原始粗糙、一般刻在大石头上。贵州和云南的彝文石刻中墓碑为多，而凉山则少见。这与葬俗有关，贵州、云南彝族多土葬，因而立墓碑，而凉山则实行火葬，毋需立碑留名。

(1) 墓碑：

如云南昭通闸心场街子后面，有清嘉庆十九年彝族陆末勒及其妻龙氏合葬墓一座，墓碑是彝汉两种文字合刻的，碑文中叙述了陆氏祖先由东川徙居贵州威宁，又由威宁迁居小梁山和昭通的经过。

云南武定发窝乡分多新村王氏墓碑，立于同治七年（龙年）三月十二日，此彝文墓碑记述王氏族源和迁徙以及同宗分布的情况、赞美王氏的居住地，全文 260 字。

此外，云南罗平县中河乡戈丫村的毛氏墓彝文碑；弥勒巡检司乡彝文墓碑等，几乎遍及整个彝区。

(2) 建筑碑刻：

如贵州毕节地区大方县明代“水西大渡河建石桥记”（1592年）和明代大方摩崖碑刻“新修千岁衢碑记”（1546年）就是著名的建筑碑刻。前者全文一千九百余字，主要叙述彝族德施氏即罗甸水西祖代以来的历史，以及安邦母子建桥的缘起和桥成以后的效用。后者为贵州宣慰使安万铨捐资兴修衢道而立。

(3) 乡规民约碑：

云南武定法窝乡大西邑村有乡规民约碑，现字迹已模糊，据当地彝老讲：其内容为“共同保护乡土，抵御外人入侵。”

(4) 地界碑：

四川凉山西昌北山有罗洪家开拓土地的阴刻彝文碑记多处，用以标明地界。

云南路南北小村彝文地界碑，内容为该村地域四至，东至何处，西抵何地等。云南禄劝云龙乡安则箐的山崖上有一方摩崖界碑、用以划界。

(5) 纪念石碑：

如贵州大方的“济火纪功碑”，济火于蜀汉诸葛亮南征时，“献粮又通道，”被封为罗甸王，建立“慕俄格”奴隶制地方政权。为了追念济火功德，而立此碑。立碑年代待考。

云南路南北小村兴建水利彝文纪念碑，此碑刻于清代，记述开渠筑坝工程的捐资情况。

著名的禄劝摩崖镌字崖彝文石刻系1533年所镌，是最早的彝文石刻之一。此石刻记述了凤氏祖上四次作斋取福禄水的地方，并以父子连名的形式记述了罗婺部世袭首领自阿而

起到益镇止的 12 代名字。

纪念石碑除石刻外，也有用漆墨写于石上的。如清代咸丰七年，云南路南赵龙村的农民起义纪念碑。此碑记述滇东南的彝、回、汉等民族联合反清起义，先后攻占路南，宜良县城以及这一地区的重要村镇。但由于无强有力的组织领导，在清军的残酷镇压下最终失败的经过。

(6) 指路碑：

如云南路南县尾则村彝文指路碑。此碑宽约一市尺，高约 1.5 市尺，立于岔路口，记述此地向外抵达前方村庄的里程。

2. 铜器铭文

(1) 铜钟：

贵州大方著名的罗甸水西成化铜钟，是目前所发现的年代最早的彝文文献之一，铸于公元 1485 年，成化二十一年。主持铸造者是明代贵州宣慰使安贵荣。钟面铸有彝、汉两种文字。

(2) 印玺：

“以诺”印章是发现最早的一枚彝文印章。据悉此章得之于贵州威宁县境。铜印鼻纽、正面有彝文，自上而下，后背及纽之两侧均作波状纹；纽在正中，作提形。据西南民族有关学者译为“印章交‘以诺’用”，我们认为应当译为“以诺王手印。”近年在滇东彝区又发现一枚铜印。据有关专家考证为东汉之物。

3. 木牍文献

(1) 灵牌：

即写在木牌上的文字材料。云南弥勒彝族多在木牌上写死者的生卒年月，作灵牌供奉。

(2) 咒语牌：

凉山彝族多在木牌中间画鬼像、周围、背面写咒语。这种咒语牌用于咒鬼治病的仪式。

4. 皮书文献

即写在牲畜、野兽皮上的文字材料。1872年法国一个名叫威廉·梅斯利的军官住在贵阳时，从威宁州弄得一份用红颜色勾画的人像作边饰的，写在羊皮上的彝文手稿。

5. 陶文

云南巍山蒙舍诏遗址上发现印有彝文的陶瓦、陶砖。

6. 纸书

绝大部分彝文文献是书写在纸上的。一般彝文文献所用的纸张有土纸、棉纸、宣纸三种。

7. 其他

在彝文文献的记载和文物中还发现有兽骨、布帛、竹简、畜角制作的文献材料。

在彝文《依依书·享礼调》中就有关于用羊角作书写材料的记载。“支格阿龙呢，^①巡田至南方、视地越北方、巡视抵中央。一夜宿于地，向地乞食物，乞食无所获。三十双山羊，为大地礼品，馈赠作食物。食羊不食角，留羊角带走。一夜宿于河，向河乞食物，乞食无所获。三十双花鱼，为大河礼品，馈赠作食物，食鱼不食胆，取鱼胆带走。一夜宿于林，向林乞食物，乞食无所获。三十双青鸟，为森林礼品，馈赠作食物。食鸟不食羽，拔下鸟羽毛，蘸上花鱼胆，书于山羊角。先书一道文，君主为尊贵，尊贵当慈善。次书一道文，臣相为贤明，贤明当仁义。末书一道文，师傅为博学，博学当理智。”这段记载形象地再现了彝族人民以羽毛作笔、鱼胆作墨，羊角作纸的书写风习。

三

在众多的文献种类当中纸书的数量最多。据目前掌握的彝文纸书卷册至少不低于万册,这些纸书和部分金石铭刻,若按刻板印刷和手工抄写的制作工艺而论,可分为手抄本和木刻本,按其书刻的年代言之,则有明代文献和清代文献之分。

纸张作为彝文文献的载体,主要以写本和木刻本两种形式流传于后世。

1. 写本

广大彝区彝文文献的流传主要靠写本,写本的数量大,流传地区广,内容也最为丰实。写本文献除各种经书外,还有契约、信札、布告、柬贴,对联等等。著名的文献《西南彝志》、《宇宙人文论》、《阿诗玛》、《勒俄特衣》等都以写本的形式流传下来。

2. 木刻本

木刻本较少见,迄今发现的木刻本有,云南武定彝文译汉的《太上感应篇》(亦称《劝善经》),此书传说是明代刻本,版藏原凤诏土司署中,现尚存残缺不全的刻版三十余块,解放前由马学良收藏于北京图书馆。云南武定的《清净消灾经》也是木刻本。《玛木特衣》(教育经典),是四川凉山保留下来的唯一的一本彝文木刻本,系凉山土司岭镇荣刻印于清光绪年间。红河木刻印刷本《妮节审》,共5000余行,记载彝族的伦理道德规范,刻印年代不详,近年又在云南玉溪地区发现,元江三马头,水墨印刷版数十块,具体情况,详见方开荣等《略论云南元江三马头彝文水墨印刷版》一文。

彝文文献除石刻金文外,其他类别的文献很少有注明书